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6.1

一年出版4期，以16種語言刊出

氣候變遷的政治

Herbert Docena

南非的暴力民主

Karl von Holdt

團結經濟

Paul Singer

合作的出路

- > Uralungal：印度最早成立的合作社
- > Mondragon 合作社：成功和挑戰
- > 希臘的反中盤商運動
- > 阿根廷的自主企業
- > 世界抑或資本主義的終結？

拉丁美洲的資本權取主義

- > 在拉美抗衡新權取主義
- > 厄瓜多的權取主義 vs. Buen Vivir
- > 墨西哥對共有財的追求
- > 阿根廷新的權取主義 In Memoriam

紀念

- > Vladimir Yadov, 1929-2015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6卷 / 第1期 / 2016.3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環境和暴力民主

當科學家討論氣候變遷的時候，他們警告大眾地球暖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洪水、颱風、融化的冰川，以及社區的破壞。他們把注意力放到氣候變遷的政治上面時，他們在意的是反暖化論者、有影響力的支持者，和運動的失敗。但是精英之間的鬥爭卻很少被注意到。過去4年來 Herbert Docena 一貫報導了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架構的運作情形，這次聚焦在最近其的巴黎會議(2015/11/30-12/11)，他指出了精英之間的結盟變化，改革者放棄去碩服保守團體的杯葛。然而，他們也在激進派中去找尋潛在的盟友。總之會議結束後，沒看到什麼有太大的進展。

這期我們有 Karl von Holdt 的訪談，他是反種族隔離的社會學家，其對 Alf Nilsen 描述了他對於南非「暴力民主」的研究，並且也提出了對於其他形式暴力的解釋。Maristella Svampa 和其他人解釋了新的榨取經濟如何毀壞拉美。大型礦產和石油以及黃豆的開發計畫透過中國的經濟擴張而搭上便車，跨國公司對於利潤的嗜血，以及需要資金的國家一起共同形塑。阿根廷、墨西哥、厄瓜多的例子說明了這些計畫怎麼和想要保護土地、水、空氣的社會抗爭交手。

我們也刊載了6篇關於印度、希臘、西班牙、阿根廷的6篇文章，看看合作經濟的生存和代價。合作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嗎？或是像 Leslie Sklair 所說的資本主義下的相容物？毫無疑問的是，Paul Singer 是合作經濟的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家，他是巴西政府的團結經濟部長。像是訪談中所說的，他不是什麼合作經濟的先知，對他來說這是只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法。

最後，我們有5篇對於 Vladimir Yadov 的紀念文章。他於去年過世，是俄羅斯社會學的先驅，在共產主義下巧妙地推動社會學。Yadov 仍然是後蘇聯社會學辯論的重要人物。透過了解這位國際主義者、ISA 副會長(1990-94)的一生，我們看到學生、同事如何愛戴和紀念這位偉大的社會學家。

這期開始 Juan Piovani 會負責西班牙文的翻譯，接手 María José Álvarez 之前的工作。我們歡贏 Juan，並且感謝 Majo 和其團隊之前的努力與貢獻。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Herbert Docena是氣候變遷會議的長期觀察者，分析了巴黎高峰會的全球精英政治結盟的變遷。



Karl von Holdt是學者也是社運者，提供了南非政治的分析。



Paul Singer是學者、政治人物、也是公共知識分子，描述了其巴西團結經濟的理論和實踐。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Saeed Nowrooz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Shuhei Matsuo, Yutaro Shimokawa, Masaki Yokota.

哈薩克: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Shuhei Matsuo, Yutaro Shimokawa, Masaki Yokota.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Ewa Cichocka, Mariusz Finkielsztejn,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Martyna Maciuch,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Corina Brăgaru, Roxana Alionte, Costinel Anuța, Ruxandra Iordache, Mihai-Bogdan Marian, Ramona Marinache, Anca Mihai, Adelina Moroşanu, Rareş-Mihai Muşat, Marian Valentin Năstase, Oana-Elena Negrea, Daniel Popa, Diana Tihan,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Carmen Voinea.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氣候與暴力民主

2

氣候變遷的政治

by Herbert Docena, 美國

4

南非的暴力民主：訪談

by Karl von Holdt, 挪威

7

> 合作的出路

團結經濟：訪談

by Paul Singer, Gustavo Taniguti and Renan Dias de Oliveira, 巴西

11

Uralunga1：印度最早成立的合作社

by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14

Mondragon合作社：成功和挑戰

by Sharryn Kasmir, 美國

16

希臘的反中盤商運動

by Theodoros Rakopoulos, 挪威

18

阿根廷的自主企業

by Julián Rebón, 阿根廷

20

世界抑或資本主義的終結？

by Leslie Sklair, 英國

22

> 拉丁美洲的資本榨取主義

在拉美抗衡新榨取主義

by Maristella Svampa, 阿根廷

24

厄瓜多的榨取主義vs. Buen Vivir

by William Sacher and Michelle Báez, 厄瓜多

26

墨西哥對共有財的追求

by Mina Lorena Navarro, 墨西哥

28

阿根廷新的榨取主義

by Marian Sola Álvarez, 阿根廷

30

> 紀念VLADIMIR YADOV, 1929-2015

貢獻給開放社會學的一生

by Mikhail Chernysh, 俄羅斯

32

學者與人道主義者

by Andrei Alekseev, 俄羅斯

34

導師、同事、朋友

by Tatyana Protasenko, 俄羅斯

36

個人懷想

by Valentina Uzunova, 俄羅斯

38

蘇維埃和後蘇維埃的社會學代表人物

by Gevorg Poghosyan, 亞美尼亞

39



> 氣候變遷的政治

by **Herbert Doc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ISA 勞工運動委員會(RC44)委員



巴黎氣候變遷會議場外的抗議。Herbert Docena攝影。

對於一些參與氣候正義運動的人來說，戰線是在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的會議大廈高牆。高牆外面有來自各國的「運動」和「人民」，在街道上高喊「要系統變遷，不要氣候變遷」。高牆裡面，各國代表和企業代表則努力要維持系統不變。所以，社運老將 Rebecca Solnit 在高峰會的前夕寫說，要區分「會場外的人」和「會場內的人」。她建議是前者「才有權力改變世界」。

在場內和場外的戰線上，對於觀察氣候變遷的政治，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也模糊掉了變遷和複雜的戰線變化，不論場外場內都是。因為，若我們只看到場內要勝過場外這種間單的二分方式，那是不夠的。

> 會議室裡的鬥爭

許多這些政府官員，企業家、專家等人，以及坐在會議室裡面的人，也的確被動員去保護系統。他們捍衛國家的競爭性和利益，反對管制全球資本主義，他們做的事情其實僅僅是「綠化」而已。

但是不是所有的掌權者都是短視近利的人。的確，從 1970 和 80 年開始，世界精英的其中一個特殊團體已經開始動員要「改變系統」，但是，為的是不傷害資本主義。這些精英開始結盟，要全球管制，或是改革、妥協，至少管理資本主義的生態矛盾和對抗全球暖化，而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不讓那些激進的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組織者等有

>>

多數追隨者的人當道。

在提出「系統保留的系統變遷」中，這些改革精英，以及那些想要吸引中下階級的計畫也開始讓更保守的精英，要去反組織和抵擋那些改革和讓步。從 1980 年代開始，改革者之間的罅隙就開始越來越深了。

面對更組織化的保守勢力反撲，有些我們稱之為民粹改革者的人，像是環境保護基金會 (EDF)，Fredd Krupp 或是 Al Gore，還有其他許多官員、企業家、基金會、專家、甚至運動者認為，唯有和精英結盟，那麼改革的計畫才得以可能。為了結盟，他們開始在國內和國際的管制方式上下功夫，因為保守派會吃這一套。國際上，他們開始支持國際協議，讓排放量更低，並給予一點彈性，像是碳交易或是市場機制，然後讓他們從責任中解脫，並且給發展中國家更多的財務和科技轉移。

當這些讓步沒辦法讓保守派滿足的時候，他們倡議要更多的讓步，推動由下而上的 2009 哥本哈根協議，可是，那基本上是保守派在 1990 所達成的協議版本，只有一點點更動而已。

但是，其他場內的人而且總是漸漸成為這種策略的懷疑論者。來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進步派的官員、基金會、環境組織等對於遲遲沒有辦法改變系統感到沮喪，並且開始認為只有犧牲改革者的計畫，不和保守派結盟，要和草根社運聯合，那才有希望。

在一個 2010 年的公開信中，1 Sky 的執行長 (後來的 350.org) Bill McKibben 說：

我們需要加倍我們對於草根運動的投入，我強烈認為長期對草根組織的投資不足，將會讓我們裹足不前。當然這不是一天就可以辦到的事，這需要好幾年的深入、耐心，投入時間和資源。

這種論述已經在改革圈之中越來越普及了。在一個廣泛傳開的 2013 年由 Rockefeller 基金會所委託的研究中指出了，為什麼環境運動者一直想辦法通過其計畫案，研究者 Theda Skocpol 回應了 McKibben 和其他場內政治批評者所言，建議要培力「更廣泛參與的行動」。

> 街頭上的改革者

和這些策略一致的是，從 2000 年後期開始，民粹改革者已經加倍投資到草根運動中了，他們透過更努力的參與、更注意、花更多資源在動員那些團體上面達到其目的。

想要贏過其他的團體，這些改革者就必須不能對激進派的主張有所讓步。所以，雖然他們不一定反對市場管制的方式，McKibben 或是其他綠色和平之類的環境組織支持更直接的非市場管制，管制石化工業生產。這是一個「讓石油、煤、天然氣永遠在地下」的一個方案。

總地來說，他們呼籲要更勇敢、更有野心的國際共識，要減少更多的排放量，特別是對於已開發國家，對碳交易更要求嚴格。結果，他們反對 2009 的「由下而上」哥本哈根協議，並且比其他改革者對於類似的協議採取更批判的立場。

但是，這樣宏大的抱負或是管制沒辦法透過「聯盟」或是「遊說」而達成目標，他們已經和溫和改革派決裂了，轉向其他組織，像是學生、工人、農村、或是被排除在議程之外的人們，為的是要去採取更針對性的反資本和反政府行動。

雖然他自己逃避了反資本主義的位置，McKibben 邀請了知名的反新自由主義作者和長期對抗資本主義的行動者加入 350.org 的委員會，在地的行動者則支持社區的抗爭，包括煤礦發電和其他的能源計畫，這不只在全球北方，還包括了菲律賓。

Exxon 資助「氣候懷疑論者」。他們和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左派組織了大量的公民不服從行動，在高峰會的最後一天與其他改革團體在街上表達抗議。

但是，當他們想要比其他改革者更進一步推動激進改革、聯合其他團體、有更激烈的動作的時候，其他民粹改革者要從反企業和反新自由主義的戰線上退守，所以當 McKibben 和其盟友在「人民審判」中譴責 Exxon 的時候，他們卻不想要人民審判中提到 Exxon 或是其他所有曾經貢獻給「氣候變遷」的企業和政府。

相似地，350.org 的成員在巴黎高峰會的

>>

時候幫忙發起了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可是其他的組織者很明顯地告訴參加者說那些他們會面對的敵人是國家和資本家，而他們代表了 Arc de Triomphe 和 La Défense 的商業領域，而 350.org 宣傳的資料也建議了這個原則，就是敵人是石化廠商，是「大資本家」。而同時，也就是行動日，不足夠的人數和不足的資金使得無政府主義者和抗議者舉辦了自己的小型會議，說「x 的資本主義！」，而比較有資源的 350.org 則有巨大的 2x200 公尺的旗幟，寫著「抗議氣候罪行」和「讓其在地下就好」，這兩者讓其他的標語都看起來很小，包括了中間前面的「要系統變遷，不要氣候變遷」。

這場勝利，那取決於誰在街頭上會勝過對方了。■

來信寄給 Herbert Docena <herbertdocena@gmail.com>

> 分裂的街道上

改革者的努力和企圖讓我們更注意到了反對保守精英的行動，這種無法改變系統的行動只讓原本的改革派更加分裂而已。當保守派把簡單的改革擋下，而那些改革是有可以改變現狀的，加上民粹改革派又堅持那些改革，那麼激進派之間就分裂了。所以，有些人已經選擇和改革派形成聯盟，或是聯合民粹派，為的就是讓那些被保守派擋下的改革方案可以更進一步推行而已。他們已經強調的改革的論述，呼應氣候變遷是資本主義缺乏管制所導致。意思就是只要管制就可以改變現狀。而「敵人」主要是石化企業，「壞資本家」，和「壞精英」。其他人則反對聯盟，堅持徹底的結構性系統變遷。在不忽略改革者的利益的同時，他們堅持要超越改革的論述，然後宣稱資本的缺乏管制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所導致。增加管制雖然或許有成效，但是根本問題在於資本主義必須要連根拔除。這樣一來，敵人較包括了「好資本家」和「好精英」，就是那些為了想要保持現狀而想要「改變系統」的人。

所以戰線不是只在，也不會只在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的「場內」和「場外」。他們會在場外與場內都相遇得到。至於是否街頭上的社運者或是會議室裡開會的人會贏得

> 南非的暴力民主：

訪談Karl von Holdt

1993年，Karl von Holdt 參加ANC聯盟的遊行，當時正值南非的民主轉型。William Matlala攝影。



Karl von Holdt 長期獻身於政治與學術，也曾是 South African Labor Bulletin 的主編，而那時的勞動是南非社會運動的主要議題。他也為南非工會大會的政策部門 (COSATU) NALEDI 工作，和擔任 COSATU 的工會展望委員會的主席 (1996-7)，近年是南非國家計畫委員會的代表。他也是位於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大學社會工作與發展員院的院長。此外，他也有許多著作，像是 *Transition From Below: Forging Trade Unionism and Workplace Change in South Africa*，這是南非民主轉型最重要的書之一。他也和 Michael Burawoy 著有 *Conversations with Bourdieu: The Johannesburg Moment* (2012)。現在其研究包括了國家制度的功能、集體暴力、結社活動。他也是 ISA 的勞動運動研究委員會的委員 (RC44)。這個訪談由 Alf Gunvald Nilsen 所完成，另一個較長版本的訪談可以在挪威社會學學會的通訊上找到。

當南非在 1994 從種族隔離走向民主制度的時候，數十年的革命鬥爭似乎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希望無限。「從這持續了那麼久的人類苦難經驗中，」總統曼德拉這麼說，「必須誕生一個榮耀光明的社會。」而 20 多年來，南非的社會現實則比曼德拉說的還要複雜，儘管新的政治上自由化了，但是惡化的種族不平等、貧窮等問題還是層出不窮。在這個「彩虹的民族」，歧義是被不平等所深化的，並且產生了排外主義，排斥移民。而社會學家又要怎麼複雜且矛盾的現象？

► 南非的暴力民主

「這裡有許多的矛盾和疑惑。」von Holdt 這麼說。von Holdt 是 Witwatersrand 大學的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的主任和副教授。von Holdt 不僅是從社會學家的角度來發聲，也是從一個同時跨足學術和社運的觀點來闡述。

von Holdt 承認種族隔離取消的重要性，「我們住在這種世界，一種種族宰制、壓迫、制度化的暴力體系，並且被剝奪權力。這些現在都不見了。」同時，一種不可見的排除建構似乎持續著。對於 von Holdt 來說，若要說這個社會沒什麼變，那是錯的。相反的是，南非的社會變遷很難用簡單的概念來解釋。「政治和社會學上來說，許多概念主導了解釋國家運作和社會秩序組織的論述，這從西方現代性中孕生而來。當我們透過這些概念看看自己，很容易去說我們沒有民主，因為我們的社會太暴力了。可是，我相信我們必須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不論是去看概念怎麼從西方現代性中傳承下來，或是去看南非脈絡下這些概念的適用性，都是如此。」

這個企圖想要從不同觀點看事情的努力讓 von Holdt 去描述南非是一個暴力的民主國度。暴力和民主不是相互排斥的，這從歐洲的國家誕生歷史和南非的當代經驗中可以得證。「在歐洲的脈絡下，我們很容易去把現代性看成是好幾世紀的、安撫人民的過程，然後建立處理衝突的和平管道。但是如果我們從更全球的角度來看，就會看到這個過程和殖民征服與宰制是緊密結合的，並且是整合到歐洲的發展裡面。在南非的現代性

的歷史經驗就是非常暴力的過程，我們已經經歷這種暴力有四百年了！」

對於 von Holdt 來說，今天暴力是和南非重要的變遷緊密結合的，特別是黑人精英的形成，透過鬥爭國家而產生。他認為南非的政治「鑲嵌了社會經濟和人權，但是也保護的財產權。現在財產權的分配是被 360 年來的殖民宰制和隔離所形塑的，而且變得更加極化。」因為憲法限制了系統性的重分配，國家扮演了重分配中很重要的角色。「國家目前是南非最大的雇主，也擁有很大的預算，巨大的資源都被掌控在這裡，對於這些資源的取得於是對於精英形成來說至關重大。」他說，「若想要取得權力，那就要有侍從主義的支持者、聯盟、網絡，取得這些資源逝去建立政治資本的方式。相反地，要成為成功的企業家，你要有政治連帶，這麼一來，財富和政治是綁在一起的。權力鬥爭預設了暴力的特質，因為不同的陣營是會要去削弱對方的。這是為什麼南非的民主是暴力的。」

南非的暴力民主也透過貧窮社區的抗爭而顯現出來。這樣的抗爭通常是對於公共服務的不滿而來，也都被描述成窮人的抵抗的自主表述。但是 von Holdt 認為，那些抗議是從「精英那裡誕生出來的，透過侍從主義的組織，資源取得，然後在窮人之間展開網絡。」當 von Holdt 和一群研究員調查 Mpumalanga 和 Gauteng 的抗議事件時，他說「我們了解到在領袖和 ANC 網絡之間的密切關係，而那些領導者就是地方 ANC 的成員，主要是要去得 ANC 在地方上的權力。」然而，von Holdt 並不支持窮人被簡單操弄的論點，「他們有憤怒，那是真實的，如果在地的政治領袖想要成為精英，他們要會抓到地方人民憤怒的點，而這麼一來，窮人也是在利用領導者去取得發聲的機會，取得資源。侍從主義不總是很簡單地被精英所決定，窮人也扮演者一定的角色。」

在南非的政治地景變遷相當明顯，包括了從 2012 年 8 月 16 日之後的變化，當警察殺死了 34 名 Marikana 罷工的礦工工人之後更是明顯。這是南非暴力民主的最好代表，也就是 Marikana 屠殺。這開啟了組織的斷裂，削弱了 ANC 對於國家工會的掌控。在 2014 年，社運的進步聯盟，聯合前線，就試圖要去更新左派政治，而 ANC 分離出去

>>



2014年，社會學家Karl von Holdt在一個地方的會議，叫做Trouble。William Matlala攝影。

的激進民族主義和重分配組織，經濟自由鬥士，也動搖了ANC的基礎。「ANC的霸權正在腐蝕，」von Holdt這麼說，可是也警告說「未來還很不確定，儘管看到霸權的動搖，ANC仍然宰制著地方社區，還很有影響力。」

► 布迪厄，法農，和暴力的社會學

Von Holdt對於南非社會暴力民主的診斷是，其把暴力用更普世的角度去概念化的努力密切相關的。在Current Sociology期刊裡的一篇文章，他探討了高層次暴力和南非抗爭政治的關聯，並引用他和Michael Burawoy合著的文章Conversations with Bourdieu: The Johannesburg Moment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2)。「我對這本書的貢獻，」von Holdt說，「是在於試圖透過南非去閱讀布迪厄，去標示出其貢獻中的漏洞和忽略，因為他的作品對於秩序的再生產有了很好的解釋。」

在這個文章裡面，von Holdt探討了在布迪厄的象徵暴力和法農的殖民暴力裡面的協調與不協調之處。「殖民處境裡面，象徵暴力並不是如布迪厄所稱的那樣運作的，只解釋秩序是不夠的。法農說真正的暴力也是必

須的，但是同時象徵暴力也幫助我們去理解法農所說的種族主義和殖民秩序的暴力不僅僅是物理和物質的，同時也是象徵性的。」

「這兩位理論家有趣的是法農和殖民和後殖民的作品之中，暴力和現代性是攜手並行的，現代性本身就是暴力的。但是布迪厄如果忽略他研究阿爾及利亞的背景，則完全就是從一個西方社會走出來的理論家。我覺得有趣的是回到布迪厄，然後問西方現代性是否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子。我有點懷疑，特別是在現在西方危機的脈落下，他的預設將會難以成立。在廣泛失業的浪潮下，象徵暴力要怎麼展開？國家要取消所有的福利嗎？銀行或企業是宰制的嗎？我看都不成立吧。」

這些作品整合了Jean和John Comaroff的論述，也就是全球南方提供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視角來觀察現代世界？Von Holdt持懷疑的態度，「我有點懷疑，因為北方總是試圖要保持自己的例外主義。」而根本的議題仍然是北方要怎麼去宰制知識生產和財富榨取。宰制關係不會取代，這是說好像南方會宰制世紀，「而是有些分析的洞見和概念的創新含蓋了一種對於北方理論體系的反思，包括其對於北方現實的關係。」

這和 Raewyn Connell 對於南方理論的呼籲是平行的嗎？「我會這麼想，就是在那方做理論，而非南方理論。我覺得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考是很難的，因為我們已經這麼西方了，那要怎麼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理論？這又從哪裡來？」而南非社會學已經從那些和世界體系核心有密切關係的人和語言那裡發展出來，對於知識生產已經影響很大了。「我們是那些白人占領者的後代，所以我們從那裡開始。我們很西方知識緊密的結合，可是其他人可能也探索了原住民的思想，這有可能會激盪出重要的火花。」

> 南非後種族隔離的暴力社會學

從西方社會學的限制開始，我們的對話轉向了公共社會學的挑戰，這個脈絡是在南非衝突矛盾的後種族隔離時代下所展開的。Von Holdt 的一生在學術和社運之間來回，堅持公共社會學不可以是純粹的反對運動。「進步的社會學家總是想像自己和弱勢階層運動站在同一陣線。那是一種進步社會學分析的特權，然後透過如此可以產生政治影響力。」Von Holdt 的研究對象是 SWOP，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成立的，也在 1980 年代長期和 COSATU 對話，但是民主轉型之後，SWOP 開始和進步的政府部門合作，這個經驗讓 von Holdt 去質問了公共社會學和政策研究之間的分野與界線。「政策社會學被

認為一樁生意，你接受付款去生產出分析結果，當你和工會合作，那研究的出發都是批判，但是一天下來，工會也會希望有政策相關知識，因為他們要用來協商。他們需要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案本身就是政策問題。對我來說，公共社會學是一種純粹的制式形式，可是政策社會學相反，被認為有點受到污染。我不認為這種看法行得通。反抗的社會和政治的社會是要存在著互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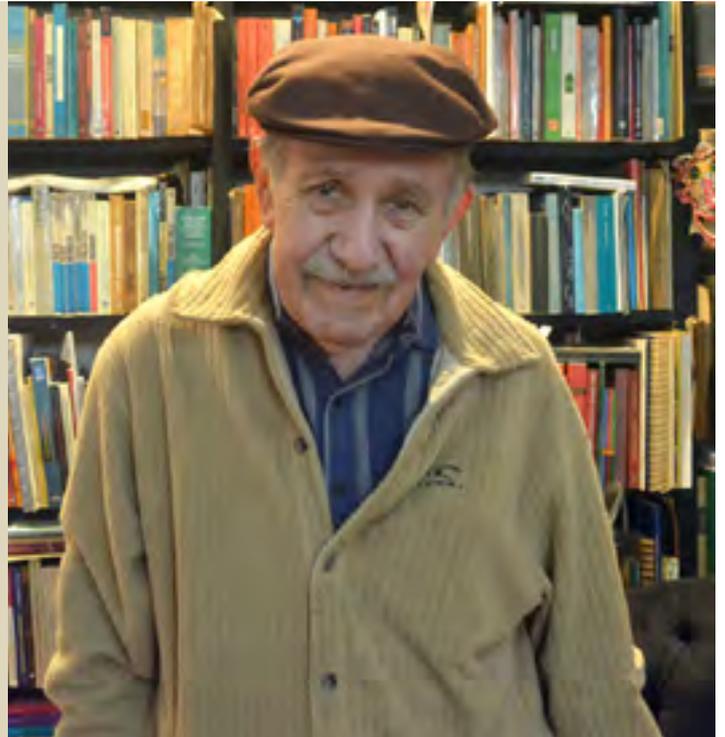
在今日的南非，對權力說真話變得更加必要了。「我們發現我們自己似乎又要再次前進了，因為我們工會的實踐和原則現在已經不是用了，而且新的分裂也產生了。舊的規則不適用了，那我們公共社會學的實踐就要有所進步。」可是對於 von Holdt 來說，這並不代表一定要有一個跟之前完全不同的公共社會學。「不論你想要產生影響力，或是抗拒，或是改造社會，你都是在和權力妥協。而那是讓人不安的。有些人對於站在批判的一方感到比較自在。然而，概念的創造力是必須和現實做出一番搏鬥的，那肯定是永遠充滿挑戰。」■

來信寄給 Alf Gunvald Nilson <alfgunvald@gmail.com>
和 Karl von Holdt <karl@yeoville.org.za>

> 團結經濟：

訪問 Paul Singer

Paul Singer 是巴西團結經濟的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他的著作包括了 *Desenvolvimento e Crise* [發展和危機] (1968),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e Evolução Urbana* [經濟發展和都市革命] (1969), *Dinâmica Populacional e Desenvolvimento* [人口動態和發展] (1970), *Dominação e desigualdade: estrutura de classes e repartição de renda no Brasil* [宰制和不平等：巴西的階級結構和收入分配] (1981) and *Introdução à Economia Solidária* [團結經濟導論] (2002)。他在奧地利的 Vienna 出生，然後 1940 年搬到巴西。1953 年時他 21 歲，成為 São Paulo 的鋼鐵工人工會的戰鬥成員，領導了一個歷史有名的，為期一個月的大罷工。1960 年他結合了其工會和知識活動，開始在 São Paulo 大學教書，是社會學和經濟學教授，並同時在 Princeton 大學研讀人口學。後來他的政治權利被獨裁政府剝奪，於是協助成立一個知名的智庫 Centro Brasileiro de Análise e Planejamento (CEBRAP)。回到學校後，Singer 也幫忙成立了工黨 (PT)，成為 São Paulo 的計畫部部長，後來則又擔任國家團結經濟部長。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和團結經濟的經驗，以及這樣的計畫怎麼貢獻給一個更平等的社會。巴西 São Paulo 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Gustavo Taniguti 和 Fundação Santo André 的教授 Renan Dias de Oliveira 負責訪問 Paul Singer。



| Paul Singer.

GT&RO: 在 1969 年你和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Octavio Ianni, Jos Arthur Giannotti, Juarez Brandão Lopes 和 Francisco de Oliveira 成立了 Centro Brasileiro de Análise e Planejamento (CEBRAP)。這是批判知識分子的群體，誕生在軍政府最壓迫的時期。其對於開始討論巴西貧窮問題的重要性何在？

PS: 我從事貧窮的研究，那時，是因為我都說我們了解到這個國家的真正問題就是貧窮，而我們卻不知道到另外一面，也就是富裕。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測量不平等，我們沒有取得所有資源的管道。那時，我會說：巴西真的問題是排除，而排除是貧窮的結果。

>>

GT&RO：在 1979 年，好幾年政治迫害之後，你回到學術界，之前是被軍政府強迫退休。在 1980 年你參加了工黨的成立運作，那時，什麼讓團結經濟的議題開始被討論的？你有參與嗎？

PS：沒人在 CEBRAP 真正聯絡了團結經濟。我想這是一個未知的議題。後來，我發現團結經濟是被天主教會所激發產生的。團結經濟一詞是被智利經濟學家 Luiz Razeto 所創。他寫作許多相關的書，他現在退休了，但是仍然出版許多著作。而工黨在 80 年代的成立也和團結經濟無關。我的興趣主要從個人權利出發，就像許多人一樣，我對於實存社會主義一夕之間消失的印象很深，很快的柏林圍牆倒塌，政治體制也崩蹋了。工黨內，社會主義的崩潰帶起了意識形態的危機。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政黨，我們想要在巴西建立一個不一樣的社會。所以我花了很多力氣去把「民主社會主義」帶進來。

1990 年代巴西面臨的巨大的危機，主要影響的是就業體系。6 千萬的工作不見了，我有很深的感觸，因為那之前，巴西沒有這樣的失業危機。後來百萬的勞工就沒有工作了，沒有房子、沒有收入。這是真正的社會悲劇。因為如此，我邀請教會來看看巴西的合作社。Caritas 被認為是天主教會的改革者，創造了 1000 個合作社，主要是失業者組成。我發現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答案：就是項合作社，沒有失業、沒主管、沒階級。所有事情都是集體決定的，很平等。我寫了幾篇文章發表在 Folha de S.Paulo 報紙，包括了所謂的「團結經濟：一個對抗失業的武器」。我沒有創造這個運動，我只是發現了而已。

GT&RO：在那個脈絡下，你對於團結經濟的理論是什麼方向？

PS：我會說主要的參考座標是社會主義的歷史，並從烏托邦社會主義開始。這很有趣，因為我以前喜歡閱讀大量的馬克思、盧森堡、還有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但不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我在 São Paulo 教的課的其中一門中，學生要我說更多關於這些著作，所以我開始讀 Robert Owen 的作品，我認為那很棒，於是成為我的參考點。

GT&RO：你後來成為了 São Paulo 的計畫部長，那時市長是 Mayor Luiza Erundina (1989-1993)。那時的反貧窮計畫和團結經濟有關嗎？若有，怎麼有關？

PS：一開始沒有，但是後來是的。São Paulo 是一個拉美最大的都市，是一個廣大且不平等的都會，而市政府那時是第一個左翼政府，第一個女市長。此外，Luiza Erundina 從貧窮的家庭而來，北巴西的 Paraíba 而來，她加入了工黨，變成領袖。當然其政府任內，貧窮是主要目標，因為我們要去解決 1980 的危機。我記得市長、工會、和我自己辯論怎麼降低失業率。後來 Lula 說工會無法支持失業者，但是也不知怎麼辦。這樣來說，工會就無法支持合作社成員。這是客觀。雇主是為了減稅，但這不可能，因為會讓基本社會福利的預算縮減，像是教育或是健康。

所以在這個脈絡下很難。第一，我們開啟了一個任務團體去執行第一個無住屋人民的人口普查，為的是讓他們免除飢餓。後來，我們創造了可回收物品合作社，這是團結經濟的開始。透過從 Caritas 我們發現了團結經濟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決定採用合作主義的百分之百精神，1996 年之前我深信那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式。

GT&RO：在 2000 年，兩個重要的辯論團結經濟的場域被開啟了：巴西團結經濟論壇 (Fórum Brasileiro de Economia Solidária) 和團結經濟的全國部門，也是團結經濟部的分支 (Secretaria Nacional de Economia Solidária)。你可以告訴我們他們成立的政治脈絡嗎？他們怎麼在國家、都市的層次幫助的團結經濟的運作？

PS：脈絡是高的失業率，雖然說沒有比 1980 時代還高。Cardoso 的政府是新自由主義的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對抗通膨，他透過降息解決，可是導致高失業率。這讓工人的議價能力減弱了。

當 Lula 在 2002 年當選的時候，他已經確定團結經濟會被納入政策之中。工黨也採用了團結經濟，並且仍然在政綱之中。當 Lula 開始其總統任期開始之後，團結經濟運動開始有了全國會議，推動勞動就業部的誕生。這發展得很快，2003 年在 Lula 就任後更是如此。我們花了幾個月從他那裡得到

授權，在6月團結經濟部誕生了，因為我們不會在沒有社會運動的情況下去制定政策。那不合理。於是，論壇就是讓政策制定在社會運動中被討論，並實況報導團結經濟的問題、宣稱、需求。

今天的團結經濟涵蓋了全國，從亞馬遜到南方。這規模還不夠大，但是也不小。除了團結經濟部，相通法律也開啟了國家的委員會，許多的成員都是從論壇而來。

而勞動部也用這個預算去推動和幫助團結經濟。我們在Rousseff的第一任特別推動，加入了Brasil sem Miséria計畫。5到6個部門是計畫一員，而團結經濟部負責都市地區，把合作社機會帶過去，我們估計是這個政策幫助了50萬的家庭脫貧，但我們不是第一個推動制定的國家，法國才是。2001年第一個社會論壇中，我們和法國的團結經濟部長見了面。

GT&RO：你可以解釋這個大學為主的組織創業計畫是怎麼運作的嗎？

PS：這個搖籃是從美國開始的。重要性在於他們刺激了學生和教授去在校園裡面組織公司。而他們運作地非常好。Rio de Janeiro的聯邦大學有團結經濟的第一個創業計畫，那是1994年。我們的則不同，我們不是科學的創業，主要是社會議題。在幾年之後，我們到了合作社在Rio展開了，而現在巴西和許多公共學校也有自己的創業計畫，這是被部門所支持的。現在巴西的大學裡面有110個類似的組織，這些創業組織也對於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學生從各地而來，經濟學、地理、社會科學、工程。但是大多數是中產階級，是第一次去幫助窮人，這教育意義很大。

GT&RO：從你的觀點說，什麼是工會主導經濟組織的最大好處？巴西團結經濟目前的挑戰又是什麼？

PS：我會說最大的優點是民主。人們一起

工作、尊重彼此，沒有競爭。團結經濟顯示了在巴西我們有大30000的合作社，包括上百萬人。我們也從其他地方來的支持，像是天主教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 (CUT)，還有大學。這是非常新的經驗。

在那些對於巴西團結經濟的挑戰來說，最重要的是團結經濟有點脆弱。許多在5年內就消失了，而總體來說，小型企業壽命較短。可是，當然不是所有小型企業都是如此。例如：我們有恢復生產工廠 (Fábricas Recuperadas)。當一個破產的工廠被合作社所取代接管了，就是恢復生產工廠。巴西有67間，阿根廷或其他拉美國家也有很多。

GT&RO：你怎麼看比較巴西的團結經濟和拉美或是其他國家的經驗？

PS：我也還在學習團結經濟，每天還是持續吸收新知。地方的層次來說，處理企業的脆弱性是一大挑戰，而文化也很重要。內部的衝突和爭議也對於企業的成敗很重要。我們必須知道怎麼去避免衝突，還有化解衝突。我不太確定團結經濟對於世界來說重要性為何，但是和其他的國家，像是南非、菲律賓、南韓、或是歐洲、拉美等比較起來，很重要的是建立民主的工作環境。我們必須從中學習。■

來信寄給 Gustavo Taniguti <gustavotaniguti@gmail.com>

> Uralungal, 印度最早成立的勞工合作社

by **Michelle William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勞工運動委員會委員(RC44)



| Uralungal的施工作業。那是印度最早的工人合作社。

在印度的 Kerala 有一個重要的合作社，它讓主流的預測跌破了眼鏡 90 多年了。Uralungal 勞工合作社 (ULCCS) 是一個有 2000 人的勞工自主擁有的合作社，建造大的基礎設施，像是道路、橋樑、建築物等。其名字是以北方 Kerala 的 Malabar 的 Uralungal 村莊為名，並且是地方替代生產模式的先驅，代表了團結經濟的許多特質，像是民主、平等、團結、互惠、整合網絡。這些原則鑲嵌在合作的文化之中，透過工人、法律，制定出合作的目標，確保安全、獎賞、

好的工資的勞動。這些目標是需要民主工作環境、組織、平等重分配來配合的，甚至在高競爭的環境下勝過那些大型、追求高獲利（通常腐敗）的承包商。

ULCCS 對於民主和平等原則的承諾，其追溯到剛成立初期的幾年。在 20 世紀初期的 30 和 40 年代，Uralungal 是政治暴動的核心，有權力的農民和工人運動在 Malabar 興起，民族主義運動有激進的轉向，而共產黨也興起成為了一種霸權。在合作社成立初期，形塑了一種替代經濟的風氣，這是奠基在

民主決策和貢獻給社會的剩餘價值，以及生態永續、集體生產等價值上。幾年下來，合作社用自己的民主組織、集體決策、替代文化去克服了每項挑戰。

主流的經濟學家總是預測，即使工人合作產生了，生存下來了，然後茁壯了，他們會很快的轉變成資本主義工廠，失去其崇高的工人控管和產權的目標。這是錯的，事實上工人的表現代表了一種經驗上的啟發，提供了未來實踐的無價的寶貴課程。

在 ULCCS 的成功經驗的中心是其對於參與的

>>

承諾，還有直接民主的保證。接下來我會闡述參與民主的這個面向。

► 決策制定和工人民主

合作社是如何在沒有資本主義技術的規訓與誘因之下，去確定嚴謹的工作協調和有效率的生產？他們又要怎麼確保工人的產權沒有侵蝕管理者的權力，或是工人會不偷懶呢？更具體而言，ULCCS怎麼在階層和參與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看看ULCCS的經驗，特別是在勞動過程中的效率與參與層面。

在ULCCS，工人在年度會議的時候選出理事會主席，然後討論報告的細節，回顧去年的狀況。這個年度會議不是徒具形式而已，而理事會的選舉也不是預先決定的。一旦理事會選出來後，他們就有自主性去洽商合約、選擇科技、分配工人，然後還包括其他日常事項。因此，理事是合作社的管理團隊，意味著管理階層是由工人選舉出來的，這和資本主義企業是相反的，因為在那些公司裡面，管理者是被指派的。

施工場地是透過領班去領導的，這些領班是從工人之中選出一過程選出那些具有管理能力的工人。然後，該領導是被尊重和信任的。工人和領班繼續討論分工和施工程序，例如，在集體的午餐（透過合作社準備）的時候討論。雖然審議是很包容的，但是一旦決定了事

情，所有人都必須遵守。若是違反領班的指令，怠忽職守，財務出錯，表現不佳，那會有所懲處。不過這是很少見的。

民主程序透過規律的溝通而達到合作的目的。工作場域的領導者要出席每日會議，所有的領班、理事會成員、技術人員都要參加每週會議，而所有工人都要參加每月會議，而新的進度要報告，然後工人可以提出批評。全部的財務報告都要通過年度會議討論。雖然許多的會議要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但是這也產生了一種集體產權、團結、共同目標的文化，有利於提高生產力。

► 參與和市場競爭

ULCCS的主要挑戰在於和私人承包商的競爭，因為合作社不能以縮減工人福利或是偷工減料來削價競爭。而合作社總是考慮合約的細節原則，這得到了很大的聲譽。從印度的公共工人計畫的惡名昭彰的腐敗經驗來看，證明我們做得是正確的。

合作社的競爭優勢是從高勞動生產力而來的，並且從有效率的科技使用和勞工的勤奮與技巧而來，這是勞動密集建構過程的重要資產。舉例而言，一般柏油石子路的品質成本取決於不同層的厚度，紅土結合的效率，柏油混合的平均度，以及適時的金屬層的加入。每一步驟都需要工人的技術，勤奮、承諾。此外，工人也會有動機去維護一個適

合的工作排程，和避免不必要的浪費，這對於合作社的成功準時完成一項工作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工人的技術和承諾，並不簡單的只是管理員或是經理，都是合作社的主要資產。ULCCS已經以主動參與決策制定為優先考量，同時也維護彈性的排程和好的工作環境。

機械化已經改變了工作的場域，而許多的工作，包括建造業，已經變成不必要的，去技術化的。此外，在連結到機械化的步伐變化上，也有可能變成工人對於團結感的理解，在知道政治危險的前提下，合作已經被深化的民主所回應，並且是透過三種方式，包括深度的承諾給透明、公開審議，重新評估工人建議回饋的重要性，以及改善其技術發展的計畫。

另外一個可能發生的危險是在臨時工間承諾的減少。以前許多的會員都還是創始世代的親戚，但是現在有許多的工人並沒有親戚和地方上的連結。許多的參與者擔心在年度會議上審議的品質，以及工人在週末要加班的意外。這裡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只有繼續的教育合作社的歷史，承諾和奉獻的傳統，以及讓ULCCS變成今日這般規模的原則。因此，ULCCS作為純粹的合作社的存在是政治的，其必須產生合作的價值，在資本宰制的社會中突顯其重要性。■

來信寄給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 Mondragon 合作社： 成功和挑戰

by Sharryn Kasmir, Hofstra University, 美國



Mondragon 旗艦企業的破產。大型電器 Fagor 的製造機。

的資本主義。這在幾十年後的新自由主義侵襲之後，可說是個好消息！

在西班牙的 Basque 的 Mondragon 一般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工人自主合作社工廠。其在 1950 年的天主教行動計畫中開始的，今天的 Mondragon 包括了 257 個金融、工業、零售、研發、發展的部門，僱用了 74,000 名員工。其製造很多東西，包括商業廚房設備 (Fagor 品牌)，工業自動機。旗下的 Eroski 零售品牌在歐洲有 2000 個店面，而銀行 Caja Laboral 和社會安全合作社提供了資金上的協助。合作社沒有工會，也沒有外部投資者。然而，每個勞工都是投資者，也都有投票權。每個合作社成員都是合作社大會的代表，在大會裡面做出重要決策。

規模和成功讓 Mondragon 成為合作社實驗的一個特例，而且有很多地方的確值得效法尊敬。合作社保留了金融危機期間在西班牙 Basque 的成員的工作，增加了團結感，成員也接受減薪，做額外的投資，並且有必要的話可以在合作社之間轉移。Mondragon 限制管理階層的最高薪資要在最低新的 9 倍之內，而西班牙的總體比率則是 127:1。Mondragon 的核心原則是勞動自主，而非資本主導，這在把剩餘產值分配給勞工時明顯看得出來，勞工的帳戶在 Caja Laboral，那裡有勞工私人帳戶，並且可以做投資。

雖然，Mondragon 通常是我們所想要的替代資本主義的另類模式的起點，一些對於合作社中的一般勞工、勞動條件等重要的問題通常都被忽視了。

合作社勞工集中在 Basque，但是 Mon-

在金融危機後期和反擰節運動風起雲湧的期間，在美國和歐洲興起了一股對於非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和團結經濟的興趣：學術界或是社運界認為工人擁有的合作社可以保住工作，給工人更多的勞動控制權，並鼓勵團結。他們也認為這樣的轉變是社會主義的種子，或至少是民主的或是公平

dragon 在 1990 年代走向了國際化。現在則有 100 間子工廠，多數在發展中國家和後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工資低和新興市場。這些工廠不是工人擁有的，而勞工也沒有享有那些合作社勞工所有的權利。那些勞工僅僅是薪資勞工而已。即使在 Basque 和西班牙，工廠和零售的合作社僱用了大量的臨時工和短期顧約勞動。今天，只有大約二分之一的 Mondragon 的事業是合作社型態，三分之一的員工是合作社成員。

2013 年，Fagor Electrodomésticos (家用電器部門) 宣佈破產，這是一個 2008 年的金融危機的犧牲者，也動搖了西班牙房地產市場和家用電器業。Mondragon 補助 Fagor 好幾年，但是在 6 個國家的 18 個工廠的投資是很大的負擔，要一直到 Mondragon 合作社不繼續補助之後才減輕其負擔。這個破產威脅了 5,600 個工作 (從泡沫化之前的 11,000 個下降)。

當人口超過 25,000 人之後，Mondragón 城市就受到了很大的影響。Fagor 成員

在波蘭的 Wroclaw，2008 年的抗議低薪罷工和反工會鎮壓帶出了對於 Fagor 的三層勞動力的問題，就是合作社成員在 Basque，臨時工在西班牙，薪資勞動在子工廠。這意謂著 Basque 的工作保障、薪資水準、民主參與是透過剝削其他地方的勞動力嗎？

一個對於在中國的 Mondragon 子工廠的研究中，比較了合作社的工廠和外國資本家的工廠，發現工資很低，工時長，環境差。而且就像那些資本主義廠，Mondragon 在中國投資的工廠也在生產勞力密集的產品，這可是合作社成員投票贊成的策略。

而這些子工廠可以轉換成合作社嗎？雖然 2003 年的合作社大會呼籲「社會擴張」，擴張民主參與，可是國家的法律架構讓這件事情很難達成。Mondragon 的非營利組織希望可以強化全球社會經濟網絡，幫助美國的聯合鋼鐵工人組織可以發展出有工會的合作社，並且和 Pittsburgh 的最近發展出來的商

業洗衣廠合作。可是 Mondragon 的子工廠仍然像標準化的工廠，儘管他們這麼做不是要最大化股東的利益，而是要保留合作社和工作。

許多的學者相信 Mondragon 對待非會員的勞工很好，認為他們努力教育在墨西哥的勞工和在西班牙 Galicia 的接受資本主義工廠的合作社成員。其他則認為 Mondragon 的全球策略證明了合作社不能在資本主義中存活，因為面對競爭，合作社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工廠。

然而，這些問題有更大的歷史脈絡。在 1980 年代晚期，我發現了工廠裡面的狀況，一般工人參與決策的情形，還有工人的認同等，這些都沒有比鄰近有工會的資本主義工廠來的要好。此外，合作社成員對於 Basque 運動並沒有太大的團結感。Basque 是那時候的一個左派社運聯盟。Mondragon 作為一個組織，在政治中風暴中沒有迷失，而合作社成原則保住工作，但是，在地的金屬製造業工人就選擇了罷工。

Mondragon 或許會成為非資本主義的避風港，但是，這樣的經驗帶給了我們很多的學習機會，特別是當我們把工人，包括工會成員、契約工人、薪資勞工，和勞工階級運動放在中心的話，更是如此。以建立勞動和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說，什麼是合作社的角色呢？而 Mondragon 的平等主義又如何強化更大了政治視野？Mondragon 提供了一個出發點，讓我們去思考非資本主義，也是一個寶貴的案例，讓我們思考階級和權力之間關係等的艱難問題。■

來信寄給 Sharyn Kasmir <sharyn.m.kasmir@hofstra.edu>

> 希臘的反中盤商運動

by Theodoros Rakopoulos, University of Bergen, 挪威



在Thessaloniki的玉蜀黍市場。

節提供了替代方案。工人或下層中產階級在希臘的城市已經經驗過了非正式合作社化了，特別在 2011 和 2014 年更是如此。

在 Thessaloniki (希臘的第二大城)，許多該城市中心或是郊區的居民都得利於「反中盤商」運動。不支薪的參與者要協調草根合作社去分配食物，幫忙農產品提供者去販賣產品，直接銷售給顧客，並且採用開放農業市集的方式。2012-2013 年，希臘有將近 80 個這樣的組織。於運動的高峰期，在 Thessaloniki 就可以看到每個星期日都要這樣的市集，千餘人會參加。

這個反中盤商的運動是透過非正式合作社所組織起來的。都市的運動者在窮的或是中產階級社區組織農人，找場地，市場，停車位等等。這些市集是為了抵制中盤商而設的。運動者聯絡附近的農人，邀請他們到市集，這樣就形成了長期的關係。運動者會用一種規律，但非正式的方式組織起來，而農人用將近一半的價格販賣新鮮的產品給人們。這些關係則透過要求農人不要投票給新納粹政黨 Golden Dawn 或是不支持種族主義政策而得以正式化。

合作社通常是一種對於經濟危機的草根式回應，而在希臘這種情形已經 6 年了，它提供了工人安全網，保住工作。這現象也發生從 1930 年的美國經濟蕭條開始，到 1990 年東歐的後會主義困境，一直到 2001 年的阿根廷危機。當希臘面對了持續的蕭條，隨著失業率從 2015 年的 27% 開始，一系列的動員就助長了高度政治化的非正式合作社網絡。這也影響了日常生活的社會安排和政治領域。遍佈希臘的草根團體用一種新的激進化方式蔓延開來，並透過建構一種互惠的社會經濟，稱作「團結」或是「替代」經

濟，因此而得以可能。

在過去 5 年來，這種非正式草根運動的網絡是和希臘左派日漸升高的知名度有關的，而且也和 Syriza 這個激進左派聯盟的興起相關。只是，這種相關也對運動帶來了困局，就是 Syriza 的選舉勝利和最近要接受新的擰節政策，讓團結經濟面臨的嚴峻的挑戰。

> 行動的時刻

圍繞在非正式合作社而形成的這些實驗，像是以物易物，或是時間銀行等，以及合作社所組織的社會福利服務，像是社會診所和藥局，這些都為擰

> 冬眠的時刻

今天，許多在地的家庭的基本需求，是透過這種非正式的農業分配。可是，在2013年高峰之後，該運動就起起落落。許多反中盤商的組織現在都在冬眠了，也越來越少開會，甚至不活動了。

反中盤商運動的主要問題在於不友善的脈絡。合作社主義分子要面對政治的迫害，無法得到市場擺攤的許可，而有些農民則因為「在公共場所非法擺攤」而被罰錢，這是一個 Thessaloniki 開放市場組織，是中盤商的遊說團體。個人精力的消耗也是重點之一，許多人因此無法在運動中擔任領導角色。

第二個問題就更複雜了，因為運動人士對於非正式運作是否會保證活力的關心一直有表達出來。許多運動者討論了合作社化，但是，這也需要一個進步的政治和法律架構才行。

當然，這樣的努力會得到進步政府的支持的。在2015年1月，也就是 Syriza 掌權的前幾個月前，該運動開始進入了冬眠階段。面對國家強制介入和無法完全讓農人進入運動之中的困境，運動人士轉向希望有更好的結構條件支持「團結經濟」。他們期待政黨輪替，也轉去支非正式合作社。有些人則擔心「收編」的情形，

可是多數的團結經濟社運人士期待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氣候，「一旦左派執政，那就太好了」一位運動人士這麼說。事實上，許多的會議中都討論「我們正在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情」，而一對領導運動人士則建議「運動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很簡單地動員農民。」當 Syriza 的成員開始加入（或是「滲透」，像是一位運動者開玩笑地跟我說的一樣）的時候，大家很清楚知道 Syriza 會帶領走向「團結經濟新時代」。

> Syriza 掌權

該政黨為了選舉，成立了一個傘形組織，為的是去強化其底下的群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這個方式讓團結經濟取得了國際知名度，呼應了 Syriza 的受歡迎程度。可是該黨的政綱並沒有在草根層次去針對運動的發展。反而是我們已經看到了社運人士在複雜的情境中變成了和 Syriza 結盟，也有人選擇退出運動圈。

同時，食物團結經濟已經逐漸地消失了，不論數量和吸引立上都是如此。許多原本的草根團體現在都搖搖欲墜了，在「被收編」和「固體化」之間擺盪。有些運動人士是這樣描述這個運動在擁抱國家中的部份轉型的：「anathesi」，可以大概被翻譯成讓渡。而其實踐則是讓渡的政治，反應了草

根運動可以讓渡其能量和潛力給政治場域，然後自己則是慢慢消失。

矛盾的是，合作社社會經濟已經和進步的激進左翼政府有所結合，可是掌權的 Syriza 卻被證明了是團結經濟發展的意外的絆腳石，這個現實是在黨和非正式團體之間展開的，更重要的是，大家期待的其實是左翼會支持團結經濟才對（一月的選舉口號是「希望將至」）。

政治動員是團結運動的血脈，而今已經遠去了。不過反中盤商運動的足跡至今還是在 Thessaloniki 的民間或是政治場域中清晰可見。社會診所和藥房仍然活躍，而由反中盤商運動建立起了合作社食品店依然相當成功。同時，Syriza 在中止擰節中的絕望般的失敗——該黨引介的新的紓困和擰節方案——已經讓許多團結經濟支持者對於制度左翼感到去正當性化了，或許更加深了草根團體和政府之間的鴻溝。在新的擰節政策的到來前夕，政府不會有空間去制定一個新的法律架構來被背書和推動合作社和團結經濟。而這樣的變化會如運動分子所言，「會從物質需要和心靈張力中快速竄出」嗎？我們還是要去看是否這些新的動態可能會重新活化了團結運動或是重塑了參與者和左翼制度政治之間不太調和的關係。■

來信寄給 Theodoros Rakopoulos <trakopoulos@gmail.com>

註1：這篇文章的田野由 Wenner-Gren 基金會贊助。基金會贊助號碼為 8856。

> 阿根廷的恢復 生產企業

by **Julián Rebón**,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Zanon水提供場在2001年被工人接管。這是阿根廷最大的恢復生產工廠之一。

那是2014年8月11日的早晨，在Buenos Aires的Garín區。400名工人在Donnelley Graphic工廠門口找到了一張通知，說這個跨國公司已經關掉了阿根廷的分公司了。工人聚集，商討對策。作為一個合作的集體，他們後來決定恢復生產。

這些工人依靠的是自從2000年開始就在阿根廷超過300間工廠所發展出來的策略：恢復生產。這體現了合作主義的主要貢獻：民主、自主結社、集體產權。這些開創了一種更民主的企業。

工人開始恢復生產的文化始於1990年代，特別是2001年的危機時期。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了經濟停滯，但是，阿根廷的危機從這些恢復生產的工廠中得利，主要兩個原因。第一，許多關閉或是倒閉的工廠帶來了許多失業和不穩定就業。第二，這些政治危機導致了許多社會反抗運動的誕生，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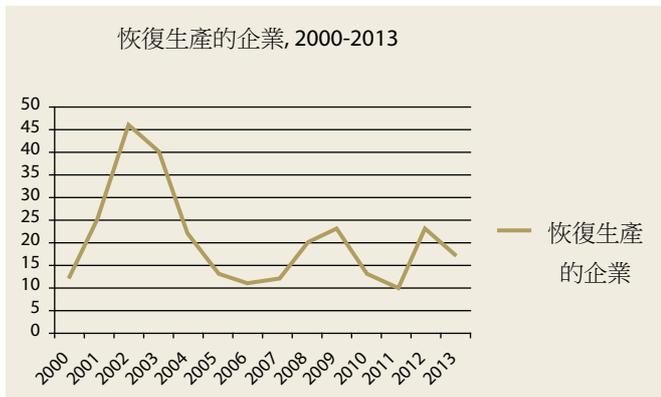
一個工人恢復生產文化出現的脈絡。對於一個有工作文化的社會來說，抗議失業變成了一種廣泛有正當性的行動。(1)

當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出現時，許多學者認為恢復生產企業會消失，但這還沒有發生，而下面的數據顯示了雖然新的恢復生產工廠數量在2002年到達的高峰，但是，在經濟回穩和失業率下降時，這還是繼續有的。工人有新的社會組織方法，持續在新的脈絡中實現。雖然失業率下降，但還是顯著(7%)，而且政治情勢不歡迎這種文化，然而，這還是擴張開來了。

恢復生產的企業似乎就是一直經營下去了。按照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的Programa Facultad Abierta所統計，311個恢復生產工廠僱用了13,642名的工人，這是2013年的阿根廷數據。雖然半數是在Buenos Aires都會區，21/24個區域有恢復生產工廠。多

數很小、或是中型，生產金屬、布料、食物等等。

恢復生產工廠已經開始開創新的就業機會，只有少數關閉。然而，他們也面對了挑戰。例如，現有的法律對於那些佔領工廠的工人視為自主工人，沒有退休金、健保、家庭福利。工人合作社要求政府重組管理階層，讓那些工人享有社會福利。但是，工人自主的工廠也面對了法律怎麼定位那些生產器具的難題。工人倚賴地方的公共使用法律去得到法律地位，但是有些地方，工人是無法有產權的，所以很不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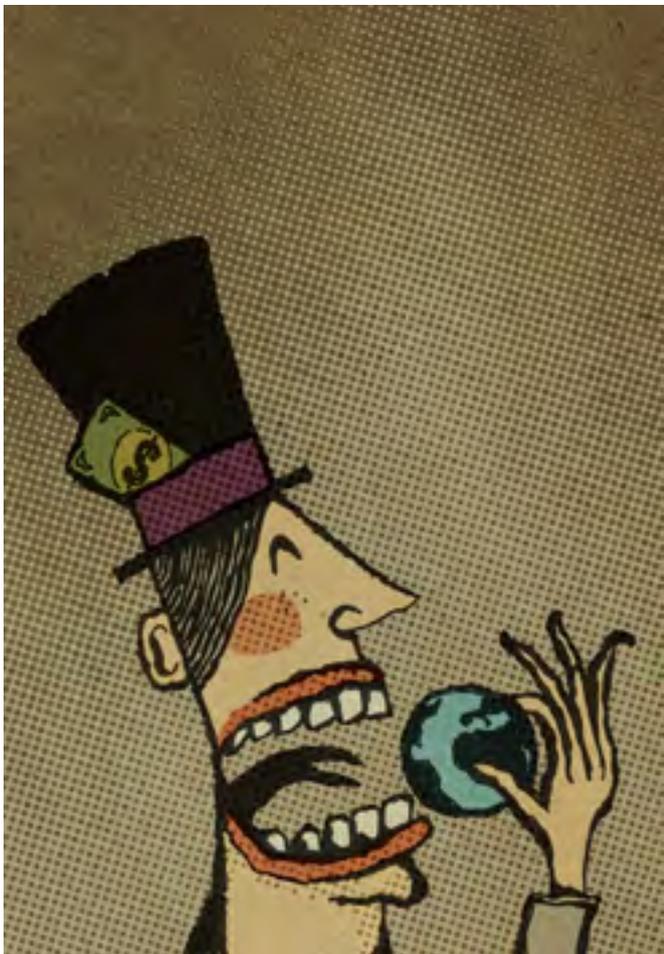
來源：作者對資料的分析。Programa Facultad Abierta,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2011年，破產法或是 Ley de Concursos y Quiebras 被附加到破產的案例上，在合作社裡組織的工人或許使用勞動信用 (acreencias laborales) 去買下破產的工廠，可是，這個法律並不適用到所有案例。定義不清的財產權底下，工人的風險是很大的。我寫到這裡的時候，警察正好驅逐了 La Robla 恢復生產旅館的佔領工人，而在 Bauen 的工人也面對了驅逐的命運。雖然社會上，恢復生產工廠是被接受的，但是法律上仍未被允許。

來信寄給 Julián Rebón <julianrebon@gmail.com>

> 世界抑或資本主義的末日?

by Leslie Sklai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英國



| Abu繪

進步的變遷看成是長期的一種否定、避免全球資本主義的長期過程，加上社會民主，還有現有的國家形式。

而為什麼資本主義註定沒辦法為人類帶來繁榮、幸福和平呢？資本主義兩個註定的缺點包括了階級分化的危機（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中產階級越來越不安全），以及生態的非永續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條，還有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型態）。而危機可以歸因給跨國資本階級（企業、政治、專業、消費），和其價值體系，以及消費主義。（註 1）

這裡，我簡單地想指出幾個進步的非資本主義轉型。第一是規模。大規模的轉型企業與企業國家是由大批的專業和消費產品與服務所支撐的，這主宰了所有人的生活，所以很明顯的是小規模結構或許可以運作得更好，讓人們可以活出自己的生命。這不是什麼地方主義的幻想。我的想法是另類、激進、進步的全球化視野，是一種小型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作社（PCC）所構築成的網絡，在各種層級上展開，主要是確定所有人類可以有尊嚴的活著。

而 PCC 是怎麼組織起來，並且在非資本主義世界釋放出全球解放的能量呢？一個簡單並且鼓舞人心的答案就是：那真的是可行的，至少在轉型的早期可行，並且無數的小規模合作社在現在世界也正在形成運作中。本期論壇的其他文章也論及了啟發人的

“**要**想像世界末日比想像資本主義的末日要簡單多了」大家早已這麼說，這是一項資本主義全球化不爭的事實。有更多作品早已談論資本主義如何邪惡了，但是較少的人在談非資本主義的世界會是怎麼樣，而這樣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的脈絡下更是如此。我的論證是，我們最好把

故事，以及進步的行動主義，可是，不太意外的是，那些主張其實都有問題。

Sharryn Kasmir 說明曾經是很壯大的 Mondragon 合作社運動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妥協。

Michelle Williams 的個和研究 Uralungal Labour Contract Cooperative Society in Kerala 則論證了工人控制的必要情況，但結論卻是未來是不安全的。在 Paul Singer 的訪談中，我們看到巴西的團結經濟如何開展，把人民帶離貧窮，可是，卻不知道社會整體如何改變。

Julián Rebón 的分析則是以阿根廷工人自主工廠為主，問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更容易生存，像是 Theodoros Rakopoulos 對於希臘反中盤商運動的研究，指出了 Syriza 的左派佔領國家看起來像是抑制而非支持整個運動。

這些之中沒有一個指出，一個資本主義剝削或是生態浩劫的出路，也沒有一個問題化國家的角色，不論左派、右派、中間派都是如此。此外，也沒有說這些怎麼和資本主義消費市場抗衡，我可以說，所有的國家都會變成階層化，而只有 PCC 這種小規模組織，不論全球或是地方，可以透過網路，避免造成許多問題。

Gramsci 在他的《獄中札記》中說，在危機的時代，老的死去，新的還未到來。雖然 Gramsci 把注意放在 1930 年代的危機情況，可是我們面對的是不同的。所以我想要聚焦在資本主義危機尚未到來的情境中。

那些行動方案的可行性試圖要避免和市場競爭，閃躲階層化國家，但是許多預設是未經檢驗的。第一個預設就是那些每日例行工作是可以繼續的，並且在 PCC 的架構下是優於大型企業的，現在許多人不論是在公部門或是私部門都已經組成了自己的 PCC，像是在地食物、交通、學習訓練、健康照顧等等的合作社。PCC 已經在全世界展開，並且在小型規模上建立起來了許多行動方案，並與資本市場共存。社區支持的農業也邁開了第一步，這努力雖然困難，但是值得。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沒有替代方案，但若是我們拒絕相信並且開始行動，那當然什麼事情都不會發

生。我在寫作的時候，我可以看到許多讀者開始微笑相信，但卻覺得難以置信。一百年前器官移植也沒人相信可能發生，或是登陸月球，或是飛機的交通等等，這些都難以置信。所以我們要相信像是社會世界論壇說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社會學對於這件事情默不作聲，這是很罕見的。即使這麼做會有威脅，並且受到韋伯價值無關的那些學者嘲笑，但是不驚訝的，研究所和提供資金者基本上很抗拒。而諷刺的是有大量的研究批判資本主義，可是，卻沒有質問資本主義本身，或是討論非資本主義社會。就連進步左派 E.O. Wright 在《想像烏托邦》中也有類似的結論。

但是，就時間上來說已經成熟可以發展出一個激進、進步的社會學的，並且開始去面對關於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或是研究的挑戰。這包括了挑戰成長主義的教條，挑戰資本全球化、社會民主、教條馬克思主義。這些已經在共生去成長這個概念中討論過了，意味著富者會不那麼富有，貧者會變得比較富有。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型態將會被人權和責任取代，開創一個永續的世界。

只有藉著忽略市場，我們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可逃避的災難性後果。這聽起來很不切實際，但是若我們無法承認阿基里斯的腳踝是有弱點的，也就是全球消費資本主義的弱點：消費者為核心的運作模式。但是消費者不能暴露在垃圾食物、飲料、文化等等之中。資本主義市場、廣告、意識形態、企業國家架構難以抵擋，但是若是家長可以了解到市場怎麼損害他們和後代，那麼就還有希望。雖然這資本主義要終結是很困難的，我們活得越久，事情就越複雜，但是我們要開始想像另一個世界。■

來信寄給 Leslie Sklair <l.sklair@lse.ac.uk>

註 1：我已經對此有論述了，見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2001) 和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拉丁美洲的新榨取主義的積累

by **Maristella Svamp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Mapuche抗議採礦。

農業(黃豆、石油、生質原料)。

我把這種現階段的資本積累稱作「商品共識」(Svampa, 2011, 2013)。這和1990的時候不一樣，現在拉美的經濟被國際商品價格所拉高，政府也重視這個利基，刻意忽略不平等的現狀，也忽略環境、經濟、社會等由國際分工所導致的不對稱。許多國家採取生產主義模式，不管負面的聲浪和抗議。

商品共識把重點放在區域的大規模的回歸到主要的開採榨取活動上，中國惡化此一情況，因為是拉美的主要消費者。2013年中國是智利和巴西的主要出口國，也是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古巴、墨西哥、烏拉圭、委內瑞拉的第二大出口國家。

穿越整個拉美，運動者和知識分子正在質問著資本積累和發展的模式，辯論像是榨取主義，buen vivir，或是美好生活的權利、共善、自然權利等等的概念。他們也關心永續發展。這些論述都建議了一種社會、經濟、自然的可能關係。這些辯論也都非常激烈，像是在厄瓜多和玻利維亞，因為21世紀民選的政府已經似乎要追求另一種發展模式了。

但是這些辯論已經越來越複雜。當政府已經擴張了自然資源的剝削時，新榨取主義的批判開始成形了。「新榨取主義」指向了以剝削自然資源為基礎的積累，並且成為了政治和社會、原住民、農民運動中的關鍵詞。特點是其把主要商品大量的出口，透過大型投資，對於生態造成傷害。新榨取主義包括了表面採礦、石油氣開採、水壩興建、擴張捕魚和砍伐森林，以及商業化

商品共識的階段

商品共識已經歷經許多階段。起源是在 1990 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華盛頓共識的時候，那時產生了拉美的轉型，不論社會或經濟都是，而拉美國家都偏好跨國公司和制定新法律去允許開採榨取活動，包括礦產、石油、基改作物。

1990 年代後期，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在玻利維亞、厄瓜多、阿根廷等國家蔓延開來。但是後來出現進步的政府卻面臨了嚴峻的限制和衝突。當國際價格在 2003 年飆高時，商品共識開始結合了高獲利和相對優勢。這個第一階段是由和開採榨取活動帶來的衝突壓制有關，許多政府發展了新的組織，和私人跨國公司合作。儘管民族主義的修辭存在著，過去十年來開採計畫增加了，而大的跨國公司則搖身成為一國的經濟命脈。

從 2009 到 2010 年，第二階段是以近一步的榨取擴張為特徵。在巴西的例子我們看到成長加速計畫在亞馬遜要建造多個水壩。在玻利維亞，工業大躍進 (gran salto industrial) 承諾了多種的榨取計畫 (天然氣、鋰、鐵、商業化農業)。在厄瓜多則是以大型採礦為主。委內瑞拉的 Strategic Plan 則會擴張石油開採，進入到奧里諾科

重油帶。阿根廷的農產食物 Strategic Plan 從 2010 到 2020 預估要有 60% 的黃豆產量、石油氣、礦產等的成長。

大型採礦也導致了社會環境的緊張。按照拉丁美洲的礦產衝突觀察計畫所顯示的，總共在 2010 年 120 起衝突，150 的社區受到影響。2012 年有 161 起衝突，包括了 173 個開採計畫，212 個社區，然而 2014 年有衝突增加到 198 起，包括了 207 個計畫和 296 個社區。2015 年 4 月以前，有 208 起的衝突，218 的計畫和 312 個社區受到波及。墨西哥是最高比例的，有 36 起衝突，秘魯則次之，35 起。智利 34 起，阿根廷 26 起，巴西 20 起，哥倫比亞 13 起，玻利維亞 9 起，厄瓜多 7 起。(http://www.conflictosmineros.net/)

在現階段，社會環境和土地的鬥爭超越了地方的政治格局，受到了全國的矚目。這包括了保護玻利維亞的 Isiboro Sécure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領土 (TIPNIS)，那裡的在地人口反對公路的興建。還有反對在巴西 Belo Monte 的大壩興建，反對阿根廷的大型採礦，還有厄瓜多的 Yasuní-ITT 計畫以及 Intag 的軍事化。無論在新自由主義或是保守政府的國家也都看到這些抗議。在秘魯，反對 Conga 的採礦計畫

運動在 2011 和 2013 年引起了 25 人死亡。墨西哥的抗議採礦和水壩運動則繼續，儘管壓迫和暴力仍然持續之中。

許多國家的政府都支持榨取主義，並且入罪和打壓那些抗議活動，限制人民的政治參與。資本對於自然資源、土地、貨物等的擴張和剝削已經讓集體、環境的權利受到侵害，並粉碎了那些解放和帶來希望的論述，像是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就是如此。在論述和實踐之間日益增加的差距代表了民主的倒退。這是從進步或是民主政治倒退到傳統的威權體制，訴諸以往的民粹或是國家發展主義。■

來信寄給 Maristella Svampa
<maristellasvampa@yahoo.com>

References

- Slipak, A. (2014) "Un análisis del ascenso de China y sus vínculos con América Latina a la luz de la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Realidad Económica* 282: 99-124.
- Svampa, M. (2011) "Modelo de Desarrollo y cuestión ambiental en América Latina: categorías y escenarios en disputa," in F. Wanderley (ed.) *El desarrollo en cuestión. Reflexiones desde América Latina*. La Paz: CIDES, OXFAM and Plural.
- (2013) "Consensus de los Commodities y lenguajes de valo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in *Nueva Sociedad* 244, www.nuso.org.

> 榨取主義 vs. Buen Vivir 厄瓜多

by William Sacher 和Michelle Báez, FLACSO (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院), 厄瓜多



建造Mirador表面開採銅礦的礦場於Tundayme, Zamora-Chinchipe, 厄瓜多。Omar Ordoñez攝影。

在2007年，總統 Rafael Correa 開啟了一個大的區域和國際的政治計畫，叫做「公民的革命」(La Revolución Ciudadana)。在2008年，一個憲法集會批准了新的憲法，賦予環境權利。2009年，政府的第一個發展計畫：Plan Nacional para el Buen Vivir (國家好生活計畫)實行了，翻轉的發展主義的典範，承認了那些「在南部正在進行中的榨取主義。」此外，先行的 Yasuní-ITT 計畫要求亞馬遜地帶的石油開採要停

止，承諾要進入到後榨取的厄瓜多時代。而在所謂的公民革命之後的7年，Correa 的政策對於採礦的石油產生了什麼影響？又留下了什麼？

> 榨取主義的擴張

在過去幾年，總統 Correa 已經擴張榨取的規模了。在石油地區，新的讓步開展了多於3百萬畝的亞馬遜土地去進行鑽井。2013年，厄瓜多放棄了 IIT 計畫，意味著 Yasuní

>>

National Park 開放開採，那裡可是許多原住民家。類似的還有 2009 年，政府開始支持各種開採大型計畫，許多是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開始的，目的是去轉變厄瓜多成為採礦國家。今天，許多的銅和金礦採集計畫持續著，並且都在敏感的原住民區、生物多樣區、還有水園區。

最重要的是，那些採礦公司是跨國的：智利的國有公司 Codelco，其在 Inta 區域擁有 Llorimagua 計畫。加拿大新公司像是 Lundin Mining, Cornerstone, 和 Dynasty Metals, 都繼續執行其開採計畫，並且受到加拿大法律天堂的保護。而中國的國有公司 Tongling 和 China Railways 也是。儘管建立了 ENAMI (Empresa Nacional Minera) 公司，厄瓜多對於礦產並沒有控制能力。

在石油區域，新的政府成功地增加了稅收，這是透過和石油公司的協商和國有公司的加入而得以可能。然而，新的開採地帶多數是給國外公司的。此外，很重要的是，厄瓜多過去 5 年收到了來自中國的銀行的 10 億貸款，這導致了厄瓜多石油的開採會繼續分裂下去，因為這個貸款是要用石油償還給中國公司的。所以，今日有 90% 的石油產收是用來還債的。

> 透過驅逐而積累

在石油和礦產地帶，那些大公司和國家政府部門使用法律的架構去驅逐當地的居民，把機器從中型礦產公司那裡徵收走，然後建立物質的基礎給榨取主義。

這些過程，很明顯的是 David Harvey 的「驅逐然後積累」，也導致了無數的反榨取主義的社會運動。那些運動深怕未來的環境和災難，就像過去亞馬遜地帶的厄瓜多一樣，會層出不窮。這些運動包括了農民，原住民，像是 Sarayaku 和 Shuar 以及 Mestizo 人 (Cordillera del Condor)。也包括在 Intag 和 Pacto 的居民，páramo 地帶的人，要求對於開發 Yasuní National Park 要進行公投的 Yasunidos 都市人。該公投還沒有被厄瓜多國會批准。

邊緣化、壓迫、社會運動的罪行化

政府已經忽略對於榨取的批評聲音很久了。在總統 Correa 的星期六廣播 (Sabatinas, 政府傳媒) 中已經聽到政府把反對聲音視為「幼稚」，並把榨取美化成「發展」和「進

步」。

刑法已經被用來定罪那些反對人士 (特別是透過「恐怖主義」或是「破壞主義」來污名那些人)。其他的法律工具，像是 código 16，已經被用來關閉像是 Pachamama 的 NGO，該組織是在亞馬遜區反對石油公司的。

最後，於礦區和石油區增加的警察和軍隊已經在當地社會造成了恐懼，還造成多起死亡。軍警威脅用來恫嚇讓那些反對聲音，使得對於榨取的公共辯論變得不可行。

我們在另外的文章 (Sacher, 2010) 中把那些服務於資本積累的國家稱之為「採礦國家」或是「石油國家」。隨著 Revolución Ciudadana 政治計畫的實行，厄瓜多政府現在開啟了一種新的物質和社會模式，是用來發展用的。過去數年，Rafael Correa 已經把厄瓜多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轉變成的採礦和石油國家。

> Buen Vivir 留下了什麼？

Correa 的政府採取了榨取主義政策，這是和他們的官方修辭是不同的。官方譴責發展主義的經濟成長模式，反對剝削，也要求終結榨取。可是政府的真正作為違反了 2008 年的憲法精神。政府認為採礦和石油公司將會執行「負責」的自然資源開採以及榨取主義必須戶被取代。可是厄瓜多的哲學家 David Cortez 已經說過，Correa 的 Sumak Kawsay (Buen Vivir) 已經提供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這是一種政治正當性的工具，甚至是一種新的權力策略。■

來信寄給 William Sacher <william.sacher@mail.mcgill.ca>
和 Michelle Báez <baemic@gmail.com>

References

Sacher, W. "The Canadian mineable pattern: institutionalized plundering and impunity." *Acta Sociológica* 54, January-April 2010, pp. 49-67.

> 在墨西哥對 共有財的鬥爭

by **Mina Lorena Navarro**, Benemérit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墨西哥



墨西哥Santiago河中的死魚。

過去 15 年間，在墨西哥興起了反對 Maristella svampa 的環境鬥爭，稱為「Commodity Consensus」。這是對於取用、控制、管理共同自然資源的衝突，而核心是榨取主義，因為他商品化了社會財富，好進行資本積累，這包括了三個過程。

- 新的工業化農業發展和國際食物場域，排除了小的農村生產者和農業經濟。

- 公路、港口、機場、鐵路、觀光客等的大型計畫，有利於榨取主義。

- 社會的分裂，由於主義的基礎建設計畫和都市擴張等，這威脅了那些受保護的區域。

這些變遷已經被國內或國際的資本還有政府組織所激化，司法策略包括了收買、懲罰、分裂社群等，並且進行剝削和市場開

發。接著，追求共善的運動卻受到暴力的對待與威脅。墨西哥環境法律中心 (CDMA) 報導了 44 名環境運動者被殺害的事件，這發生在 2005 和 2013 之間。大概在同一個時期還有 16 個犯罪行為，14 項非法使用武力，64 個非法拘禁。儘管這些事件層出不窮，但是，反對運動還是繼續出現，主要是由那些原住民或是農人所領導。農業社群已經策略性的抵制水壩的興建，因為那會威脅到那個區域。而在 Guerrero，Ejidos 社區的議會 (CECOP) 因為其 12 年的對於 Parota 水壩的阻止，素富盛名。

在同樣的時間，大概過去 15 年，墨西哥政府已經給出了 24,000 允許去進行表面採礦和石油氣開採。而該地區的基因改造食品也是另一項問題，成了農民和原住民的反抗。這些運動的抗爭得到了初步的結果，就是企業種植基改玉米必須先停止，另外一個努力對準了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要去減少運輸的成本。墨西哥 Atenco 和 Estado 的保護土地計畫反對墨西哥新的機場。觀光客計畫則威脅了農人和漁夫的生計。對於 Cabo Pulmo 的鬥爭已經成為了象徵上特別重要的事情，因為原本的計畫對於生活多樣性，限制那些大型開發案的進行。

像是墨西哥市或是 Puelba 之類的城市，許許多多的社會運動試圖去防止基礎建設計畫，特別是那些農業區或是保護區。許多區域被表面掩埋的毒物和污染的水源所影響，包括了 23,000 居民，他們現在組成了對

抗 Grupo México 的聯合陣線。此外，也有爆炸或是外洩在 PEMEX 的運作榨取下發生。PEMEX 是國家的石油公司。

即使共同體並沒有在保護領土上總是取得勝利，但他們已經可以拖延，或是甚至停止那些大型開發計畫了。透過集體的自我組織和自主政府，這些都成為可能。例如，在 Michoacán 的 Cherán 的原住民社區已經開始去限制雨林的破壞，保衛自己的社區。

毫無疑問地，這些鬥爭告訴了我們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以及可保護人類和非人類的另外一條道路。對共善的追求有兩個目標。首先，就是要把政治權力重新奪回，重新形塑我們的個群。其次是，對於自主象徵和物質再生產的能力，共善的維護和重新生產是人類存活的基本，但是我們的社群是否會被允許管制取得和使用那些共善，那就是當代文明化的基本問題了。■

來信寄給 Mina Navarro <mina.navarro.t@gmail.com>

References

- Navarro, M. L. (2015) *Luchas por lo común. Antagonismo social contra el despojo capitalista de los bienes naturales en México*. Mexico: ICSyH BUAP/ bajo tierra ediciones.
- Svampa, M. (2013) "Consensus of the 'Commodities' and languages of valu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Nueva Sociedad*, 244.

> 阿根廷的新榨取主義

by Marian Sola Álvarez,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阿根廷



Mendoza的抗議採礦。

阿根廷是一個榨取主義擴張的好例子，像是農業企業、大規模採礦、還有最近的石油氣開採。這也導致了許多反對運動的誕生。

當農業企業出現，以及其成為農業模型的時候，阿根廷進入了全球化的市場，成為了基改黃豆的主要生產者。價格的上漲也讓黃豆種植的土地面積由1996年的370,000公畝成長到2014-2015年的2千零50萬公畝。雖然大規模的黃豆和玉米的生產是用來出口，讓土地集中在外資手上，而農業還是被視為是傳統的國家產業，這種看法大大限制了辯論這種產業和生產方式的空間。

可是，許多的反對行動也出現了。民間的團體在「停止熏蒸」(Paren de Fumigar)的口號下集結，譴責

那些導致土地被熏蒸的行為。許多團體組織了抗議，抗議黃豆為主的農業模式，也批評對土地和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影響。而農民和原住民社群也已經試圖去制止這種方式，要求實施國家森林法。

1990年代開始採礦變得越來越相關。在2000年之前，地上表面採礦在阿根廷有了指數性的成長。金屬礦產，特別是金和銅，都變成了阿根廷的第二快速成長的出口，第一是黃豆。按照國家採礦部的統計，礦產出口成長了434%，而採礦計畫成長了3,311%。地方政府也提供許多採礦的優惠措施。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鼓勵了大型礦產的榨取模式，只有在2007年有少數

的變化。這個國家的法律架構已經在鼓勵新的榨取剝削模式，並套過「法律安全」和高獲利來達成。阿根廷的中央政府和1994年的憲法修正案讓這些計畫在得到地方土地上有所法律根據。結果就是大型採礦必須要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加上大財團等經濟行動者，還有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動態有所配合。

有組織對於新的採礦計畫的反抗和影響在阿根廷傳播開來了。許多的運動出現了，多數是由「自我組成的結社」(asambleas de autoconvocados)所開展。可是，這些群體可以發聲的機會有限，因為政府會管制和污名化這些抗議行動。還有這些團體也很難取得公共資源。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不只幫助增加了黃豆的產量和大

>>

規模採礦的計畫，並且也開啟了一條路，讓石油氣開採可以放行。雖然這種試驗性的技術已經被許多大型跨國公司所採用，但是政府卻擴張了這種產業版圖，透過國有公司 YPF 的運作達成。這是有效的行動，因為國家企業可以承諾能源自給自足的目標。

在 2013 年，一份在 YPF、Chevron 和 Neuquén 省之間的協定標示了阿根廷大規模開採石油氣的開始。而那時候起，在 Vaca Muerta 的頁岩儲存量和反石油氣開採的人士所被貼上的污名標籤一樣，能夠容許反對意見的空見縮小許多。然而，反抗的聲浪卻越來越多，特別是在 Patagonia 省，因為那裡的社運組織與原住民團體從事保護土地和水源

的運動由來已久。在許多其他省份，像是 Buenos Aires 和 Entre Ríos，其地方法律也都禁止進一步的天然資源開採。

新型榨取開採環境資源的模式和大規模集中的水力和核能發電廠有關，也和大規模的農業、礦業、天然氣等的所需的基礎建設計畫有關。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對於商品化和剝削自然資源有利的，也促成了霸權的形成，讓跨國公司可以有權力改變土地。

當我們質問這種新的剝削模式的時候，我們面對了多重的挑戰，可是這也是機會去辯論我們想要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儘管有著不平等，大家對於辯論的參與也都深深影響了人類、社

會、土地、環境的權利，這也對於民主的社會，至關重大。■

來信寄給 Marian Sola Álvarez

<marianoal@yahoo.com.ar>

> 貢獻給 開放社會學的一生

by **Mikhail Chernysh**,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 Moscow, 俄羅斯, ISA社會階級和社會運動研究委員會委員(RC47) 和人權與社會正義主題小組成員(TG03)



| Vladimir Yadov.

Vladimir Yadov 是二次戰前的世代的學者。他在列寧格勒出生，那是一個充滿勇氣、犧牲、悲劇、史達林鬥爭、列寧格勒圍城戰的歷史的城市。那是創意精神的地方，連結到的名字包括了 Akhmatova, Shostakovich 和 Brodsky。

1945 年 Yadov 還是 16 歲的時候，夢想要成為飛行員。當這位年輕高中生註冊飛行員軍校之後，卻發現不合格，因為飛行員必須要體格健壯的人，但 Yadov 太瘦了。他換了科目，但還是保持著翱翔天際的夢想。他註冊到列寧格勒大學的哲學系，榮譽畢業，繼續攻讀研

究所。在 50 年代早期，他為其論文「意識形態作為精神活動的形式」答辯，之後和 Igor Kon 見面之後，他轉向了社會學。那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而也在後史達林時代剛剛被解禁而已。

在那些日子裡面，社會學並沒有被蘇聯官方所認

>>

可，政府認為那是危險的科目，對於提供社會幸福手段的科學社群來說是個危害。Yadov 當他要做決策去研究俄羅斯歷史的第一個經驗研究時，因此在一個很不穩固的基礎上。其主題很有挑戰性：測試馬克思主義的假設，看看新的蘇維埃社會是否會產生新的「人」，就是一種新的個體，可以犧牲自己，成就全體。這個研究在 *Man and His Work* 這麼書中被總結，標示了俄羅斯社會學的一大突破。

那時候，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在兩極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其支持者歌頌新的系統是人類史上最進步的社會。其批評者則認為是「邪惡的帝國」，把人性黑暗面推到了極致。Yadov 顯示了其蘇聯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並沒有不同。蘇聯人想要俄羅斯變得繁榮，但是也重視私人領域，追求個人夢想與進步。從那時開始，Yadov 從未隱藏其對於本質論的強烈反對。他強烈反對所有試圖

要設計一個「本土社會學」的努力，就是那只能在國家邊界之內形成的社會學。他認為沒有 Kenyan 腳踏車，因為所有腳踏車都有共同點。他對於俄羅斯社會學的整合到世界社群這點來說，很強烈支持，把資源集結起來探索現代性。

Yadov 是唯一一個挑戰蘇聯意識形態的學者。Igor Kon, Tatyana Zaslavskaya, Boris Grushin, Andrei Zdravomyslov, Vladimir Shubkin 等人都是這個推動誠信、自由討論、開方社會的學者網絡的成員。Yadov 堅持其傳統，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和了解社會變遷的方式。因此，他對於行動社會學和多典範的偏見似乎解釋了這種持續的變化。

在 1988 年，Perestroika 讓他成為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的所長。Yadov 和他的朋友，利用這個機會讓社會學成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正當學門，開方社會學系所，

讓年輕研究生出國增進技巧，為社會帶入新的觀點。

後蘇維埃有許多幻滅的希望和期待，但是 Yadov 仍然很樂觀，終其一生。他會一直繼續為俄國和國際的社會學社群奮鬥。他勇敢克服弱點，繼續旅行，保持溝通管道開放暢通。他繼續送訊息給年輕人：我們社會學家必須是尋求了解和分享我們的了解。在 2015 年 7 月 2 日，Yadov 教授與世長辭了。那些認識他的人將會永遠記得他的微笑、想法、以及他對於社會學的推動、承諾、與信念。■

來信寄給 Mikhail Chernysh
<mfche@yandex.ru>

> 學者與 人本主義者

by **Andrei Alekseev**,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在列寧像前講話的Yadov。

6年前我才慶祝了 Vladimir Alexandrovich 的 80 歲生日，而他在 2015 年 7 月 2 日的時候過世了，享年 87 歲。人們或許會說：「這是由於久病所導致。」可是，他臨終前，其頭腦還是非常清楚，絕對還有能力工作。

我們這個學科的整個的 Yadov 時代也結束了。他比同期的學者都活得久，其他

俄羅斯的社會學先驅，像是 Grushin, Levada, Zaslavskaya, Zdravomyslov, Shubkin，都比他早過世。此外，我也讀過了許多的弔文和紀念文章，其中都圍繞在他的專業生涯和國際知名度（然而，他從來卻沒有被選為俄羅斯國家科學院院士，這是因為政治的偏見）。個別的紀念文多數描述他的個性和其一生精彩的故事。

考慮 Yadov 對於學界和

>>

教育界的貢獻，以及天賦和個人特質，這些追弔文是恰如其分的。Yadov 是個知識分子，這點毫無問題，但是他也是個知識分子階級的一員。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但是 Yadov 卻都代表了兩者。

我想要著重在 Yadov 的特質上面，也就是他是一個心胸寬大的人，可以自由的跨界。例如，他的學術著作和生涯中，他總是想要把許多不同的典範結合在一起。其並非教條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在 1960 年他是歷史唯物論的奉行者，認為那是「普世的社會學理論」，可是他也為「個殊的社會學理論」的相對自主性辯護。他也不是實證主義者，雖然他出版了好幾版的教科書「社會學研究的策略」可以清楚看到是以實證主義為基礎。

Yadov 把「多元典範」引介到俄羅斯社會學。他認為理論框架的選擇是以經驗為出發點的。他也有很寬廣的社會學視野，所以，他的「社會行為的預測」，或許

可以看成心理學，而非社會學。對他來說，學科邊界並不存在。

Yadov 也是一個公共社會學家。他有辦法把複雜的學術材料用老嫗能解的方式傳播給大眾理解，並也把真實生活帶入學術象牙塔之中。他對於學術上的競爭者和敵人相當寬容，他也對批評者很寬恕。雖然他從來沒有清楚地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但是他的研究卻很清楚地批判政府。

Yadov 很慷慨。我從來沒有問他，也不認為他會有辦法回答：他有多少「門徒」（那些他口試過的，或是批評過的，或是啟發過得學生）。我猜有上百人。

我記得有一次，在科學委員會上，Yadov 意外地拒絕了一個年輕學者的論文，因為其作品風格太難懂了，像是「小鳥」在說話。這個拒絕是透過匿名投票產生的，而 Yadov 卻幫該學生想辦法，寫了該學生想要表達的意思，讓該有天賦的學生通過了答辯。

一個人的影響力是要看他對於近處和遠處的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從這觀點來看，Yadov 的影響力涵蓋整個學科，他不僅是先驅，還是創立者，後人難以超越。別無選擇地，我們效法他，效法他對於學術、人、世界的貢獻。■

來信寄給 Andrei Alekseev
<alexeev34@yandex.ru>

> 導師、同事、朋友

by Tatyana Protasenko, 社會學院, 俄羅斯國家科學院,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享受俄羅斯鄉下小屋生活的Yadov。

我第一次遇到 Vladimir Alexandrovich Yadov 是在 Leningrad State University 的哲學系教授會議上，那時候我是個速記員，還是學生。我記得那是 1965 年初，Vladimir Yadov 剛從英國的學術訓練結束回來，然後在系上做簡報。這個簡報是非正式的，也很有趣，讓我對社會學產生了興趣。我申請並被接受進入哲學系，希望可以朝社會學專業邁進。那時的歷史唯物論主導了整個學科。

雖然我是 O.I. Skaratan 的學生，Yadov 是我的導師，同事，朋友，以及典範。後來他成為了我的上司，我們相處非常好。

真的，他是被神所愛戴的一位社會學家。他是一位願意和任何人對話的公共社會學家，不論你是否是官員、甚至是總統，或是一般的受訪者，他都願意和你說話。他從不高傲，總是和同事在會議和聚會場合上

談笑風生。他也貢獻給集體勞動，規律拜訪國家農場 Lensovetovski，那是他可以採花菜和蘿蔔的地方，那也是管理階層不太做的事情。女性的農人都很喜歡 Yadov，總是等他到來。而准將則會告訴他：「教授，為什麼你總是選那幾種蔬菜啊？你需要把餵人和餵動物的區分開來呀。」Yadov 則總是用笑話回應，然後會問有關於農民勞動條件、生活、家庭的問題。

我們一起經歷了最困難和最黑暗的時期，可是他總是樂觀以對，從不背叛任何人，並且幫助許多人。的確，他救了很多。我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受到他的支持，是他建議我要去擔任我們系上的黨書記的職位，好保護系上不受攻擊。畢竟，共產黨是辯論和爭論社會學最常見的公開空間。

同時，我們也沒有停止做研究、調查，但是我們也喜歡讀偵探小說。Yadov 特別

>>

愛，那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故事可以發展智力、邏輯思考、增進日常生活知識。在 Yadov 被開除後，Ludmila Nikolaevna (他老婆) 或是他會來問我新的偵探小說。在那個時候，我的女性朋友都有私人藏書，包括了禁書與翻譯。她們在國外有朋友，會把書偷偷運到俄羅斯。然後，打字最快的人則把新貨拷貝一份。我仍然持有 Samizdat 的偵探小說。

Yadov 最喜歡的歌叫做「我們都被葬在 Narva 的某個地方」，由 Alexander Galitch 著。我們每次聚會都會唱這首歌，並由吉他伴奏。Yadov 總是愛唱這幾句：

If Russia is calling for her dead sons it means it is in trouble. However, we see that it was a mistake – and what a waste . In the fields where our battalion was slaughtered in 1943 for nothing. Today the hunting party enjoys the killing and huntsmen blow their horns.

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喜歡那特別的歌，他說：那是因為那首歌是關於犧牲者無意義的犧牲的故事，那些人因為共同的目標而被犧牲了，那是俄羅斯歷史上發生的事情，不論戰爭或是承平時期的。

我記得在社會經濟研究院的 50 週年紀念會上，我們呈上一桶紅酒。他很高興，要我們讓他坐在酒桶上送他回家。「想像」，他說，「Ljuka (他老婆) 打開門，然後看

到我坐在酒桶上，什麼其他人都沒有的樣子。」

我也記得他有一次從 Budapest 帶來了防水的褲子給我 6 個月大的兒子。但是後來發現褲子太小了。他抱怨說：「你把你兒子餵得太大啦！」然而，他還是想把褲子換得剛好的 size。那就是 Yadov，非常人性、友善、理解、聰明。有時候他的想法的確很難理解，因為他總是把奇怪的事情兜在一起。

我個人對於 Yadov 最後的記憶是在 2 年以前。那時 Oleg Bozkov 和我拜訪他在愛沙尼亞的家，Alexei Semenov 則是 Yadov 最愛之一，也是愛沙尼亞的長期居民，他開車載我們過去。Semenov 計畫要去競選 Tallinn 的議員，其和妻子 Larisa 則對 Yadov 非常照顧。坦白說，那次是我生命中幾次最高興的時光之一，相聚一起時，我們一起回憶，一起談笑風生，一起暢飲馬丁尼和紅酒。我們當然也討論今日的社會學，以及社會學家應該做什麼，應該怎麼回應今日的挑戰，特別是來自政府的限制。我們都會記得他生活的那一面，以及他對於人生與研究那種永不止息的興趣。■

來信寄給 Tatyana Protasenko <tzprot@mail.ru>

> 個人回憶

by **Valentina Uzunova, Kunstkamera**, 俄羅斯國家科學院,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 在學院派對中的Yadov。

Vladimir Alexandrovich Yadov曾經在哲學系開設過一門課叫做「應用社會學研究」。他上課如此的專注以致於從講台上摔下來過，因為黑板的長度比講台還長，他寫板書的時候沒有注意到而導致。我們看了嚇了一跳，可是Yadov馬上回過來繼續上課。這和年輕的、害怕意外的數學系教授多不一樣啊，何況那些教授還應該要把黑板寫滿方程式吧。

Vladimir Alexandrovich在1967年聘用了我到社會系。我們透過書記員的紀錄看到了他的博士答辯，不用說，那當然是很成功的。在歷史系的大教室中對他的公開答辯充滿了期待，特別是在Yadov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所充滿的緊張氣氛。這場答辯很難紀錄，因為觀眾甚至用喊的去問問題。我感覺到了Yadov的憤怒，而他在高大講台後面是看不見的。他試著照個規定要去念稿子，但是也要即席的去回應觀眾的批評和問題。

和其公開辯論的個性不同則是他謹慎小心的研究態度，這可以在他送給VAK（國家認證委員會）的一大疊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我們一起工作處理這些文件的時候，他突然問我在哲學系唸書的前景為何。他相信

未來是屬於社會學和社會學家的，因為這是最有趣的學科，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我則由衷相信他所言，對我的選擇也不後悔。

接下來我要說一個在1970年發生的故事。列寧主義社會學家(共產青年聯盟)不太支持共產主義辦公室的決定要去移動我的兩位同事和朋友。其中一位和外國人結婚，另外一個則隨著家庭移民了。在紀錄中，我們看到官方的建議並不被採納。而我們集體的立場是「要遷徙是個人的選擇，每個人有權利選擇要去什麼地方」。我們團結一致，也公開力挺，這驚動監視的官方單位。「他們太張揚了，這一定有人在背後撐腰。」他們這麼覺得。結果就是我們有人慘了，要為這樣的立場負責，而Yadov就是第一個被趕出去的人。這就是Yadov，從不跟自己的價值妥協。■

來信寄給Valentina Uzunova <ymnesterov@gmail.com>

> 蘇聯與後蘇聯時期的指標性人物

by **Gevorg Poghosyan**, 亞美尼亞國家科學院之哲學、社會學、法律學院院長，亞美尼亞社會學會會長，ISA遷徙(RC31)、災難(RC39)研究委員會委員

有些學者的名字是和一些思想領域或是學科連結在一起的，而 Yadov 教授即是屬於這種學者。他是一個蘇聯時代的先驅，大大形塑了蘇聯的社會學。自從 1960 年代，Yadove 的著作影響了亞美尼亞和蘇聯的好幾世代的社會學家。他三個著名的作品分別是：Man and his Work (1967, 與 A.G. Zdravomyslov and V.P. Rozhin 合著),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Program, Methods (1972) 和合著 Self-reg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Social Behavior (1979) 成為了蘇聯社會學家的重要參考。對於許多年輕學者來說，Yadov 的作品可說是開關了一個新的領域。

按照其最經典的著作來說，Yadove 成為了蘇聯社會學的一個活生生的傳奇人物。少數的亞美尼亞社會學家有幸可以和其對話，並且聽他的課和演講，甚至和其辯論或討論研究。而這些人受其影響很大，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其中特別是他對於其研究和社會學的態度。他總是接納他人，從不考慮年紀、學術地位、稱謂、族群、或是意識形態。他也總是努力尊重他人的想法。其說過的一句話最讓人印象深刻：「真正的快樂來自理解了一件新的事物，並且與他人分享。」

當 Yadov 在 Leningrad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工作的時候，他試著去組織一群最有才華的社會學家。自由和批判性思考的氛圍是其特色，這和蘇聯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單位很不一樣。每一個受到這個氛圍影響的人都會受到自由批判和創意思考的文化所吸引。Yadov 有特殊的個人魅力，也吸引了許多來自蘇聯各地的年輕的學者。他特別重視年輕學者的創意，並且對於權威知識堅持站在批判的角度。



會議中演講的Yadove。

或許他自己從不知道他建立了一個廣大的隱形學院，一個知識社群，或是一種「精神性的友誼連帶」。這些是透過相似的世界觀而來的。而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其堅信社會學並需影響「社會星球的運行」，並且也在 Boris Doctorov 的最後一次訪問中強調了這點。Yadov 的著作為一個新的領域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他說：「若我們社會學家把自己侷限在寫作上，我們是沒有履行我們的公民義務的。」這個想法可以稱之為 Yadov 的最後的遺囑吧。我們亞美尼亞社會學家會永遠懷念他的。■

來信寄給 Gevorg Poghosyan <Gevorg@sci.am>